

张鸣精选集

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

张鸣
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张鸣
精选集

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

张鸣
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/ 张鸣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224-08402-3

I. 近… II. 张…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文集 IV. K2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8101 号

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

著 者 张 鸣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20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8402-3

定 价 29.00 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,出道实在太晚,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,我还不大会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。晚,一来是自己懵懂,看书倒是喜欢,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,原来就是学术;二来是时运不济,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,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,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,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。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,不再做梦当作家,改写学术论文,也经常不安份,写着写着,就变成随笔散文,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。

这个集子包括《武夫当权——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》、《乡土心路八十年——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》、《再说戊戌变法》、《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(1903—1953)》、《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》、《大历史的边角料》六本。

第一本书,是我的硕士论文,当时我初涉学术,半懂不懂,觉得军阀史好玩,里面乱七八糟,头绪特多,就一头扎进去做,整整一年半,泡在北图,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。结果做下来,将要答辩的时候,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,说我越出范围了,即使答辩也通不过。当时,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,按他们的说法,党史系的人,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,做了别的,就是犯规。显然,我很不服气,当时我的同学,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,一样通过,我费这么大力,点灯熬油地干,居然说不行,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,说个越界犯规,算个什么道理?后来,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,答辩的时候,总算阿弥陀佛,人家放了我一马。

我硕士毕业那年(1988),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,得到当时主编“蓦然回首”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,入选丛书。当时,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,出本书,不拿出版费,也不用包销,还能得一点稿费,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。这本书,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,这些人,有回归传统的,有求神拜佛的,也有推行基督教的,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,林林总总,眼花缭乱,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,感觉很好玩,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。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,算是一个异数。出版之后,学界没有多少反响,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,在他们看来,现在的企业

家,建构集团,弄企业文化,就是这一套,用人忠诚第一,效率第二,舅爷、姑爷满天飞,不是三纲五常,就是谈佛论道。

这本书出版之时,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。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,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,但是,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,回到老地方,有这么个学历,领导高看一眼,事少,地方静,自己感觉很合适。一心想着,等读一阵书之后,再出来不迟。

这样一闷,就闷了五年。这期间,除了给《读书》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(都退稿了),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,凡是写的字,除了讲稿之外,就是读书笔记。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,整个学界,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。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,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。这年,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,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,当时,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,姑且一试而已。没想到,大概一个月之后,杨晓敏给我回信,说是可以签合同了。这本书,名叫《乡土心路八十年》,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。书的出版,很是费了一点周折,期间,上海三联改组,班子大换血,杨晓敏也离开,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,最后都退掉了。还好,我的稿子没有被退,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,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,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,已经是1997年了,此时,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。

这本书,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,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。由于我们的近代史,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,因此,改革开放之后,外面的信息进来,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,很不满意。我出来这么一说,有些人感到挺新鲜。因此,这本书卖得很好,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,而一些老学者,比如孙达人先生,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,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。

在《乡土心路八十年》交稿之后的几年里,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,这大概是我毛病,至今也改不了,琢磨一个题目之后,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,就兴味索然,只好再弄另外一个,我所谓的研究,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,一般不讲究什么“需要”。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,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: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;二是满人

政治；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本身有什么意义。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、顽固派的传统说法，甚至帝党、后党的说法，在我看来，也是一团混乱，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。在甲午战后，整个国家的上层，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？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，如果变法成功，太后就要退休，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，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，就比较听得进去。同时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，统治民族——满人，有自己的政治圈子，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，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戊戌变法时，尤其明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，因为变法的措施，对满人的特权，有很大的损害。在这本书里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，说是康有为的《新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为变法制造了舆论，推动人们解放思想，投身改革，在我看来，恰恰这“两考”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，欲作教主马丁·路德的作派，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。事实上，几千年来，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，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，功高盖世。他们称皇帝为圣上，只是情势上的客气，圣人只有一个，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。尽管如此，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，在启蒙上价值尤高，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，才学会了怎样开会，怎样发言，怎样表决。

很遗憾，我的这本书，影响最小，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，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。写完这本书之后，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歆之赐，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，作为我的博士论文，这就有了《拳民与教民》。这本书，现在已经跟《乡土心路八十年》合在一起了，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。

我的义和团研究，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》开始的，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，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，在民间教门上打转，而是将运动的起源，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。但是，作为中国人，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、信仰、戏曲、民俗、巫术等文化因素，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，是如何起的作用？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，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，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

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。同时,教民,即中国的基督徒,是怎样一个群体,面对义和团的追杀,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。

《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》一书,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。在这本书的写作中,我尝试用散文体,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,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,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,串起来看,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。我注意到,清末新政、北洋政权、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,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,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,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,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,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,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,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,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,厘清这个脉络,对认识百年中国,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,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当然,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,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,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。

余下的几本随笔,跟历史文化有关,跟学术也有点关系。严格地说,都是我的读书笔记。直到今天,我看书依旧“恶习”不改,随着自己的兴趣来,信马由缰。看到什么,但有所感,就立马把它写出来,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、太刻板,就走随笔路线。我的随笔里,有很多小故事,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,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,几笔就交代完了,之所以要写,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。久而久之,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,只是带注释的随笔,充分暴露我的“野狐禅”的本色。

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,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,我这个人,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,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,很有点野路子,而且归属不明,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,属于三界不收、五行不属之辈。此次出版,基本上保持原样,只做了少量的修订,想要大改,实际上也不可能。像我这样的学者,做学问,无非是傻子编筐——边做边像,现在像还是不像,读者自己评判。

一次喝酒,我对李零说,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他马上说,这是我的名言。一查,果然,他先说的,有字为证。不过,我说这话时,没看过他的名言,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。李零有随笔集曰《放虎归山》,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,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。跟他比起来,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,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,而且,我想,我能回去。

目 录

脸谱军阀

- “五四”传统与军阀余荫 / 2
-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/ 6
-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/ 12
- 袁世凯的“选举” / 17
- 进化论的牺牲品 / 19
- 买个总统当当 / 26
- 军汉“韩青天” / 28
- “臭棋篓子”段祺瑞 / 30
- “三不知将军”和他的诗 / 32
- 孙殿英和他的“麻将相术” / 37
- “马桶将军”的用人术 / 39
-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/ 41
- 各大马路巡阅使 / 43
- 神仙治军 / 45
- 昔日南天王 / 47
-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/ 49
- 前头捉了张辉瓒 / 51

性格武夫

-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/ 54
-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/ 57
-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士兵 / 64
-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/ 67
- 有兵便是草头王 / 69
- 瞄准射击 / 71

不可不读的檄文 / 74
穿长衫的军人 / 76
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/ 78
合法化的黑社会 / 80
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/ 82
流氓大亨的脸面 / 86
杜月笙的“维权”生涯 / 88

文人的脾气

顺人章士钊 / 92
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/ 94
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/ 96
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/ 101
文人的舌头 / 103
上了梁山的《苏报》 / 106
吴稚晖两次“冤”的际遇 / 108
文人打手的故事 / 111
文甘草的故事 / 113
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 / 116
留辫子的大师 / 121
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/ 123
因“病”而囚的章太炎 / 125
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/ 128
大学者的“呆气” / 130
有一种儒者是这样生活的 / 132
革命·诗·酒·佛·女人 / 134
会武术的武侠小说家 / 136

皇宫里的隐秘

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/ 140

雍正的天真 / 144
花儿与皇帝 / 148
做皇帝的故事 / 150
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/ 154
有为政府的代价 / 158
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/ 161
帝王之尊 / 164
光绪之死的公案 / 167
康熙的才学 / 170
帝王的市井情结 / 172
“佛见喜”李莲英 / 174
骗术与禅让 / 176
政治里的巫术 / 178
神仙与皇帝 / 181
洗马与东宫 / 183
关于割人的话题 / 187
太监是从哪儿来的？ / 189
太监“恶”吗？ / 192
太监都干什么？ / 198
宦官的“家室” / 201
小人不可得罪 / 203

个别女人

西太后、义和团和外国公使夫人 / 206
西太后想要的“借口”和不想要的“扎花” / 210
女祸与女主 / 214
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/ 218
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/ 222
唐八先生 / 225
太政治的花业 / 227

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/ 232

说说重臣

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 / 240

可人张之洞 / 242

鸡犬升天之后 / 247

两只老虎跑得快 / 249

翰林与弄臣 / 252

在劣绅与藏书家之间 / 256

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/ 258

卧轍代表 / 261

官运挡不住的人 / 263

总理县长唐绍仪 / 266

关于三个“猛人”的神话 / 268

“官屠”刀钝 / 270

左宗棠晚年的“骂人事业” / 274

名人肚子的故事 / 276

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/ 278

铁面法官手里的“冤案”及其他 / 281

借口的故事 / 284

外 篇

狱吏之贵 / 288

排名的重要性 / 291

尊严与权力 / 293

艺人的立场 / 296

“吃大菜”及其他 / 298

面对战争，我们能否有一点悲情？ / 300

“光绪”来了 / 303

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/ 306

脸谱军阀



“五四”传统与军阀余荫

“五四”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，引进西潮，提倡新文化，追捧德赛两先生，还上大街游行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，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。接着就是“问题与主义”，社会主义论战，科玄论战，最后是有了共产党。自延安以来，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“五四”精神，大会开完了开小会。虽然有的时候“赛先生”总是排在上首，但从来也没有把“德先生”丢下不管。多少年了，无论中国人外国人，都觉得“五四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，“五四”是现代史的开端，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，“五四”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。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，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“五四”的原点。什么“救亡与启蒙”，什么全盘西化，什么唯科学主义，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。

然而，每当提起“五四”，我总要想到军阀，因为“五四”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，大总统是徐世昌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。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，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，“五四”的作用，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，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。我们的民族，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，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，兴亡更替，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。明亡，大家说是学风空疏，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，晚清势危，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。“五四”和“五四”以后，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，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，直到今天，我们的“五四”情结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。

军阀是个坏东西，这没问题。其实，近代以来，凡带上个“阀”字的名词，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（在老祖宗那里，“阀阅”好像还是挺中

性的,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),军阀、学阀、财阀、党阀……细排下去,大概还有十几个。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,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,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,行为粗鲁,不讲道理,看上哪个女学生,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。不幸的是,“五四”前和“五四”后,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,有枪的,说话声音就大。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,“五四”上街抗议的时候,学生一批批被抓,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,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,就是不理睬。后来的转机,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,北京政府害了怕,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。其实,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,还有军阀,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,此公时在湖南前线(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),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,今天一篇新式的《驱鳄鱼文》,明日一通仿《讨武曌檄》,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,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,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。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?我说不清,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。

在这里,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,问题的关键,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。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,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。《新青年》风靡海内,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,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。而军阀的政治操作,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,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。“五四”以后的军阀,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。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,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,一边做“精神讲话”,告诫部下,上下级就是君臣,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。他自己则坚持“五不主义”,其中“不借外债”和“不进租界”还真是做到了。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,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,背诵他的语录。像章是瓷质的,语录也有本。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,没有语录,更不能做“精神讲话”,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——庙会道,自己就是道首,

所有几万官兵都是教徒，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。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“口”，孙殿英发布命令，往往就是神谕，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。

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。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，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，但结果却更好。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，碰上了一个顾和尚，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。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，讲还不算，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，官兵受戒后，发给受戒证章一个，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。相比起来，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，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。当然，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多，也是爱国、爱群和忠义。冯玉祥的军队，全军领洗（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，其实不确），每营配有随营牧师，开办基督学校，按时讲道做弥撒。自然，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。

动静更大，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，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，也有几位，比如山西的阎锡山，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，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，搬到了山西农村，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，整个组织起来，一套是村、闾、邻的行政网络，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“息讼会”、“监察会”等。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，由政府发给补贴，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，阎锡山管他们叫“村干部”（这大概是“干部”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，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，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“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”）。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，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，定期检查，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。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，马上进行思想教育，教育不好，则送到县上的“莠民工厂”去劳动改造。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，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。凡农村的成年男子，都要加入保卫团，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，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，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，靠的就是保卫团。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

现,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,农村组织化实行政、学、军三位一体化:县、乡、村三级,既是三级行政组织,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,又是三级民团,每级的行政首脑,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,在改革的同时,实现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。

现在我们该知道了,在“五四”以后的二三十年代,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,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。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,后来有过;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,后来有过,甚至连“村干部”这个名词,还在叫着;个人迷信和崇拜,后来也有过,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,每人还不止一个(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,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)。

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,而军阀、土匪、马贼、帮会龙头、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。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,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,影响更不比前者小,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,使得这些人格外地活跃。可惜的是,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。中国政治的资源,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,日本二道倒的,俄国二道倒的,还有本土的,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,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。

历史就是这样,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,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。

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

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,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,不仅挨批,还要挨骂。而北洋军阀中,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,在一般人看来,印象则格外地差,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。

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,但最出名的两个,一南一北,南有干帅(广西军阀陆荣廷,字干卿),北有雨帅(东北军阀张作霖,字雨亭),相比较起来,陆荣廷昙花一现,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,而张氏父子,则纵横天下几十年,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,身材瘦小、其貌不扬的张作霖,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,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,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。

不过,在当年,张作霖这个胡帅,口碑却不怎么样。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,直系的吴佩孚、冯玉祥的兵,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,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,都比奉军好,道理非常简单,奉军的纪律差,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,走到哪里,都免不了鸡飞狗跳。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,轮到张学良当家,也没有多少好转。著名的“三不知”将军张宗昌,就是奉系的大将,在他统治山东期间,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,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,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,也不计其数。

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,从袁世凯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吴佩孚到张作霖,数张作霖的统治,最横暴。1925年,奉鲁联军南下江南,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,无恶不作,最喜欢的事,是抓住小脚女人,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。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,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,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。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,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。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,都受不了这